

GUIZHOU MINGGE YISHU LUN

贵州民歌艺术论

游方、飞歌、对歌，常会引得上山的农夫，放牧的山童，田间耕耘的农民感情上的共鸣，互相唱和，成为劳动群众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贵州民歌概述

贵州民歌的主要种类

贵州民歌流传

贵州民歌音乐特征

贵州民歌特点

贵州民歌的保存

贵州民歌的发展道路

贵州民歌大量走向世界舞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贵州民歌与其他民族艺术特点

刘大泯
王义一著



刘大泯 王 义 / 著

贵州民歌艺术论

GUIZHOUNINGGEYISHULUN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贵州民歌艺术论 / 刘大泯, 王义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221-13098-3

I. ①贵…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民歌—研究—贵州省 IV. ①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209号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书 名	贵州民歌艺术论
作 者	刘大泯 王 义
出 版 人	苏 桦
责任编辑	戴 俊 周湖越
装帧设计	郑亚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mm 1/16
字 数	415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098-3
定 价	46.00元

序

民歌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最能直接反映现实，被人民群众普遍掌握，广泛流行的一种短小的歌唱艺术”（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的民歌历史源远流长，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文学的起源便是劳动人民在劳作时发出的“杭育杭育”声。民歌，可说是中国文学的发轫。从“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集为《诗经》始，民歌经过数千年的兴衰更迭，表现形式多有变化，内容题材愈加丰富，历朝历代都有着新的内涵和外延，却总保留着原始时期“诗、舞、乐”三位一体的特征。它是将文学、音乐、舞蹈直接息息相连的文艺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独为此，民间艺术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在文艺领域的直接映射，是民心所向、教化所染。正如班固所说，是可以“观风俗，知得失”（《汉书·艺文志》）的。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居住着逾50种不同民族的人民。贵州民歌种类丰富，体裁多样，民族文化的多元，自然风光的优美，是贵州民歌产生和发展的天然温床。山谷水畔，田间地头，勤劳善良热情的各族儿女用民歌这种形式传递各自的历史、文明的讯息，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八音坐唱、土家族高歌、彝族“火把节”对歌、水族双歌……他们歌唱生活，歌唱家乡，歌唱爱情，歌唱四时美景！多少辈人的口耳相传，继承发扬，最终使民歌成为多彩贵州文化中一颗璀璨耀目的明珠。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是具有现代的传播价值。多彩和谐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推动贵州省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最鲜明的贵州印记、贵州特色、贵州标志。贵州的民歌应该走出贵州，走向世界的大舞台。《贵州民歌艺术论》是我省民歌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理清了贵州民歌的历史、现状、种类、特征、功能，深入研究了各类型民歌的艺术特点，进而思考贵州民歌的传承及保护、发展，是一部翔实完备的研究著作。本书将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等主要民族的民歌作了深入的分析，将其艺术特征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关于民歌的保护以及侗族大歌走向世界的思考，深谋远虑，极具参考价值。两位作者是我省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其中刘大泯同志还是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师范学院教授。他们长期从事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积淀颇深，在撰稿期间深入全省各个地区采风，走村访寨，收集整理了许多民歌歌谱及歌词，这对于贵州本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本书既是研究贵州民歌的学术里程碑，也是贵州民歌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辑录，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中央和贵州省委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贵州灵山秀水孕育出的多彩民族民间文化，是先辈遗留给子孙后代的瑰宝。《贵州民歌艺术论》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两位学者撰写的另外一部专著《贵州侗戏文化研究》也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大泯和王义同志作为我们民进优秀会员，对贵州本土文化的热爱，必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贵州，关注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贵州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宣传工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插上双翼，飞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 左定超

2015年11月于筑

目 录

CONTENTS

1	绪 论
9	第一章 贵州民歌综述
19	第二章 贵州民歌的主要种类
155	第三章 贵州民歌现状
167	第四章 贵州民歌传承类型
222	第五章 贵州民歌特征
270	第六章 贵州民歌功能
288	第七章 贵州民歌保护
297	第八章 贵州新民歌的发展脉络
308	第九章 贵州侗族大歌走向世界的思考
312	第十章 瞿小松与贵州民歌
323	第十一章 贵州民歌与其他民歌的艺术特点
348	附录一 我们应为民歌醉
355	附录二 贵州民歌艺人简况
365	附录三 部分贵州民歌
423	参考文献
425	后 记

绪 论

何谓民歌，就是劳动人民之歌。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世界各地，每一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动人的民歌流传。周耘在《中国传统民歌概论》中认为：“民歌，是对民间歌曲的简略称谓。民间歌曲也常常呼作民间歌谣，简称民谣，大略相当于英语的‘folk song’，德语的‘volks lied’。”^[1]“民歌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真切的反映。它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广泛流传和集体加工的漫长过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亲密伴侣。”^[2]

中国的民歌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淮南子》：“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古人抬木头时就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孔子编订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其中的《国风》便是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诗经·国风》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西周至春秋中叶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其中几首名篇《伐檀》《硕鼠》《将仲子》采用巧妙的比兴手法，塑造了许多鲜明动人的形象，不但有高度的思想性，还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诗经》之后，又出现民歌的一个高峰代表作品——《楚辞》。《楚辞》包括两类作品，一是屈原及楚国诗人根据民谣曲调创作的诗歌，一是经过整理的楚国民歌民谣，为我

[1] 周耘. 中国传统民歌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二版.

[2] 江明惇. 汉族民歌概论[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国民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石。而后，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相和歌，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以上的优良传统。其中《战城南》《十里从军行》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民歌。

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渐形成。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转》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民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然而，宋朝中叶，一种叫“跳覘”的活动从闽西一带的客家人中流传到农村。跳覘，本意是祈吉攘凶、保佑平安吉庆，它有一整套独特的画符作法程式，然而，聪明的法师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把群众喜闻乐见的农村民歌引入跳覘之中，使之成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法事活动，一部分为娱乐，也就是唱民歌。于是，农村民歌就进入了室内演唱模式。民歌，也就随之出现了人物、情节、故事、表演，出现了有男有女的覘公、覘婆（男扮女装），而后，又逐渐深入到庙会、婚嫁、建房、祝寿等民俗活动中。自此，农村民歌出现了两条平行发展的道路：一是山野田间的即兴唱和，另一种是职业歌师的室内娱乐民歌。

元代（公元1271~1368年）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仍有以“令”命名的民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情绪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相传，农村有“太上隐者”唱民歌的记载；宋朝大文人苏东坡也留下了“山中木客解吟诗”的佳句。又传，农村民歌为唐末落第秀才罗隐所创，民间至今还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歌提及他：“会唱民歌歌驳歌，会织绦罗梭对梭；罗隐秀才造歌本，一句妹来一句哥。”由此可见，民歌至少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

明代（公元1368～1644年），清代（公元1636～1912年）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逐渐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期（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民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50余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被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民间文化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民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禁唱。有关民歌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来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民间歌唱活动的记录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6000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至今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从各民族遗存的有关资料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均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古代的民歌音响，实际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窥一斑。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直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民歌。全面、有计划地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当代才能成为现实。20世纪以来，民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达到了高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广大农、牧民的觉醒，民歌得到了振兴。这个时期民歌的显著标志是大量的内地新民歌向东部沿海地区传播，部分边远地区兄

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区传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题材的新民歌空前繁荣。苏区时期，农村民歌成为了有力的战地宣传武器，书写了“一首民歌三个师”的辉煌篇章，一曲《苏区干部好作风》唱遍整个苏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民歌在宣传土地革命、歌唱新中国等方面更是闻名遐迩。

1949年以后，民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而且音乐格调更加活泼、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各个民族以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甚至尚无文字，民歌仍然是他们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着“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相比之下，汉族由于戏曲、说唱的迅猛发展，民歌演唱活动不如兄弟民族活跃，沿海不如内陆地区传唱的民歌多。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一个显著特征。

民歌是中国歌谣的基本体裁之一，流传分布极广，蕴藏也极为丰富。一种看法认为，凡是流传于高原、山区、丘陵地区，人们在各种个体劳动如砍柴、放牧、割草或民间歌会上为了自娱娱人而唱的节奏自由、旋律悠长的歌曲，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歌。另一种看法认为，从体裁特征而言，草原上牧民传唱的牧歌、赞歌、宴歌，江河湖海上渔民唱的渔歌、船歌，南方一些地方婚仪上唱的“哭嫁歌”，也都应归属于民歌。因为它们同样具有在个体劳动中咏唱，歌腔自由舒展，自娱、娱人等基本特征。一般来说，这种广义的民歌概念更有助于我们对民歌体裁艺术特色的理解。民歌，主要分布在高原、山乡、渔村及少数民族地区。

民歌是中原移民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融合，以及受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它产生于劳动人民中间，人们在山上砍柴、摘木梓、伐木放排、铲松油、挑担及田间劳动时，或为寻觅同伴，以驱野兽强盗；或为消除疲劳对歌打趣；或诉幽怨、或泄愤懑、或表男女爱慕之情等等，都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唱戏一半假，民歌句句真”，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劳动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而其中又以情歌数量最多，也最富特色。正如民歌所唱：“自古

民歌唱风流”“民歌唔唱唔风流”。诸如爱慕、试探、追求、初恋、热恋、拒爱、送别、相思、断情等等，均用大量形式各异的民歌来表达。如贵州布依族的一首民歌里唱道：“高田埂上打呜呼，小妹屋家吃晚饭；小妹听到呜呼响，筷子一扔碗一丢。”表现了乡里妹子听到情哥唱民歌的哟嗬声，便无心吃饭的天真活泼形象。又如著名的《生死缠》：“入山看到滕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树死滕生缠到死，滕死树生死也缠。”歌随人走，这首表现爱情生死不渝的民歌，不仅广泛流传于黔南，且在黔东南、黔西南、黔西北和周边省份都有传唱。

民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作的，它语言朴素真挚，曲调流畅优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民间歌谣如同山中的野花，在时代的变迁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民歌可分为一般歌谣、劳作歌、放牧歌3类。

一般歌谣在中国汉族地区分布甚广，就贵州而言，有“赶马调”、黔北地区的“茶内调”、贵阳地区的“立房调”“栽秧调”等等。

劳作歌常用于农业劳动中，是为了鼓舞劳动者的情绪，提振干劲，由专门的“秧歌帮子”在田间地头演唱的一种民歌。

放牧歌是放牧者为吆喝牲畜或互相问答逗趣所唱的民歌，多为少年儿童及未婚青年所唱，曲调活泼，唱词生动，富有情趣，常带有吆喝性的衬词。

这些民歌的特点为：

1. 节拍、节奏较自由。即便主体部分节奏规整，也往往在乐曲起始部分增加一个呼喊，如《印江（县）土家高腔民歌》。

2. 旋律起伏较大。如《梅花》这首歌是贵州安顺一带流传的民歌，其旋律有时也作为花灯演唱。音乐情感深切，歌词比喻含蓄。跳进的旋律较多，音调富有特色，其曲调骨架与江南征调式民歌有着某种联系。

3. 上下句结构较多。有多字体和大句子体，南方有一部分五句子体。

4. 歌词往往只有一两段，并多用对偶句子。

民歌小调的音乐旋律有以下特点：

1. 节奏较匀整。

2. 旋律较婉转、细腻。如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桂花开放贵人来》等等。

3. 多为起承转合的规整结构。这种句式一般为一个乐段，也是中国文学艺术诗歌的典型手法，演唱者要注意起句的平稳，承句的自然，转句的转折点，合句的终止式。如《情姐下河洗衣裳》《斑鸠出来咕咕咕》，两首民歌歌词和音乐旋律均为起承转合贯穿全曲或主歌部分。

4. 歌词往往有多段（分节歌），并常用长短句。如《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苗族飞歌》《彝族民歌》等等。

贵州拥有得天独厚最好产生民歌的自然环境之一。各种民族节日中游方、飞歌、对歌，常会引得上山的农夫、放牧的山童、田间耕耘的农民感情上的共鸣，互相唱和，成为劳动群众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并在民族民间社会中的文化传承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州民歌极为丰富，最古老的民歌形式是侗族、苗族、布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的历史性民歌。其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是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劳作生活类民歌。

苗族民歌根据其内容可分为游方歌（情歌）、酒歌、苦歌、反歌、丧歌、劳动歌、时政歌、儿歌、谜语歌等类，曲调各不相同。飞歌是流行于黔东南的一种特别的民歌演唱形式，一般在山上放声歌唱，其曲调高亢，豪迈奔放，余音震山梁，非常有特点，其内容有恋爱、时政等，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等。有传统的歌词，也有即兴编唱的内容。

布依族民歌尤具特色，种类有古歌、叙事歌、情歌、酒歌和劳动歌等；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和重唱；曲调有“大调”“小调”之分。每逢喜庆节日，歌声昼夜不停。布依族人民喜欢唱歌，各地民歌曲调不尽相同，同一地区的民歌，也因歌词内容、演唱场合和歌唱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曲调。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特点。

侗歌历史悠长，其音乐大体可分为南部侗族民歌和北部侗族民歌。南部侗族民歌多有乐器伴奏，常见乐器有琵琶、牛腿琴、侗笛、芦笙等；而北部

侗族民歌则多不用乐器伴奏，偶尔用木叶吹奏伴唱。侗族民歌按形式大致可分为“大歌”“小歌”“场坝歌”“叙事歌”“酒会歌”和“拦路歌”6种。

彝族民歌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歌、民歌、情歌、舞蹈歌和儿歌等几大类。在彝族民歌中，表现爱情的很多，而有的民歌则专用于男女社交这一特定场合。如彝族“火把节”的传统习俗，就是一种专门的社交活动。在这种场合，成对的青年男女，可以尽情对答酬唱。通常以对唱为主；对唱告一段落，再接以齐唱或集体应和。用于这种场合的民歌都以小嗓轻声吟唱，旋律委婉动听。歌词多为即兴创作，也有成套传统唱词，并大都朴素自然、形象生动。

土家族民歌是由歌词与乐曲结合而构成的同一体民歌，是文学与音乐交会的产物。土家族民歌的歌词属于语言艺术，它表情达意、被人感知；土家族民歌的乐曲以声音的外化形式，产生美的抒情效果，直接作用于听觉，创造性地显现了土家族民歌的抒情内容。歌词与乐曲的结合塑造了音乐形象，丰富了民歌形式，因而使土家族民歌的艺术魅力长存。

仡佬族民歌和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形式简单朴实、平易灵活，经过群众广泛的即兴编制、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民歌直接联系着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唱，它是无数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仡佬族民歌中的题材较为广泛，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作为口头文学形式的传唱却为生活带来了无比的乐趣，同时也传承了自身民族文化。

水族民歌按其形式可分为单歌、双歌、莞歌、调歌、诘歌等；按其内容则可分为古歌、颂歌、生产歌、风物歌、风俗歌、酒歌、情歌等。双歌是水歌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双歌以组为单位，分歌前的说白和主体的吟唱两部分。双歌，尤其是寓言性的双歌，十分幽默、风趣，寓意不直接表露，必须根据当时演唱气氛结合歌的内容去揣摩。双歌多在热烈庄重的酒席间，主宾对阵时演唱。

回族的宴席曲是西北地区回族人民专门在婚礼及其他喜庆集会上演唱的另一种民歌，也是流行于贵州回民迁入地区的民间传统演唱艺术。宴席曲是单一的清唱，并伴有简单的舞蹈动作，其曲调婉转柔和，内容十分丰富。一

般把宴席曲分为5类：叙事曲（多为两句和四句式，以爱情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说唱曲（民间说唱形式，说文分起头、正文、结尾，句子长短不齐，语言生动，内容广泛）、酒曲、散曲和五更曲。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和唱、随唱、问答、独唱加和唱、对唱加和唱等。宴席曲舞蹈基本上是2人或4人对舞，旁人伴唱或众和。

.....

贵州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往来，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在生产、生活中相互渗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现象。

贵州民歌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终于形成了别具风格的地域文化现象，它们在部分地区各民族中流传，是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贵州民歌以本土深刻的族群记忆，演绎苗、布依、侗、彝、水等世居少数民族缤纷的浪漫风情，生动地呈现出华夏土地上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中国文化中千年流传的“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

第一章 贵州民歌综述

贵州简称“黔”或“贵”，位于我国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东邻湖南，西接云南，北倚四川、重庆，南毗广西，处于发育较为成熟的荆楚文化、古滇文化、巴蜀文化、古越文化的交叉点上。全省面积176128平方千米。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近4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8.9%，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10万以上的有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人口上万的有壮族、毛南族、瑶族、蒙古族、满族等。贵州是古代苗瑶、百越、氐羌和濮人四大族系交汇的地方，又是汉族移民较多的省份，加之贵州地理环境的多样，山川的阻隔，历史上长期实行“土流并治”，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形成多元的复杂体系，构成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廊。各民族在迁徙、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既杂居，又聚居”的分布状况。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在贵州都找到了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而且长期保持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在贵州，就某一文化的局部区域而言，它与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迥然不同，表现出“十里不同风”的特点，仿佛是一个互不干扰的“文化孤岛”。但从全省范围来看，这许许多多的“文化孤岛”，又显得千姿百态，相互融合成为“文化千岛”。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一些古老的文化在贵州延续下来，形成一条穿越时空的神秘隧道。这种多元文化的保存、共生的展示，不仅在国内，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文化现象，长期形成的山乡异俗，显现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成为鲜活的文化生态博物

馆,给人类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召集全国的艺术工作者编撰了3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贵州也相应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1],以及近年来贵州省文联等有关部门组织编撰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集粹》^[2]对贵州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民歌或歌唱生产中的劳动热情,或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或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对婚姻的祝福,或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就往往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歌曲,向本民族群众传授历史知识、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和礼仪知识。据说,过去的侗族、布依族人民的“打官司”也是唱歌,原告、被告以歌唱申诉各自的理由,调解人也以歌唱进行调解。因此,在许多民族中,小孩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学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中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

贵州民歌不仅是贵州各民族音乐的核心和基础,而且对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民族歌舞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乐曲发展的胚胎之一,它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戏曲(如侗戏、布依戏等等)、曲艺音乐的形成,同时也为戏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花灯、黔剧、侗剧、布依剧、文琴、八音坐唱等音乐中,大量的曲调至今还保留民歌的原形或变体。

第一节 贵州民歌的历史

贵州是我国南方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黔西县观音洞、桐梓县“桐梓人”,普定县穿洞、兴义县猫猫洞、平坝县飞虎山等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生产劳动,贵州

[1]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

[2] 贵州少数民族音乐集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上古文明已初显端倪。

殷商时，贵州大部属“鬼方”。春秋战国时期，境内相继有“牂牁”“夜郎”等国。秦统一中国，贵州分属黔中、象、巴、蜀等郡，境内仍以夜郎国为大。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夜郎”归汉，受封夜郎王。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平定南中后，加强了对贵州的经营，改进生产技术，提倡中原文化，并把在平叛中立了大功的卢鹿部蒙族首领济火封为罗殿王，罗殿国从此建立，开创了后世的水西政权。唐代，今贵州境内属黔中道、剑南道、岭南道。唐袭隋制，设经制州与羁縻州，实行“土流并治”。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石人部落王子罗氏若藏的儿子普贵以所矩州（夷名黑羊箐）乞内附……土人语矩曰贵，宋廷就其所语，于敕中说：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率服，惟尔贵州，远要在荒……云云”。贵州称谓首次见于史载。元代，今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当时，元王朝为了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在原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建立土司制度，把藩属关系发展为臣属关系。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贵州都指挥使，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布政使司，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贵州按察使司，自此，贵州成为明行省之一。

清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所属之遵义府，湖广所属之天柱、锦屏、玉屏、清溪以及荔波、罗甸并红水河以北地区划属贵州，今贵州疆域确定。辛亥革命（1911年）后至1935年，贵州为地方军阀统治；1936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统治贵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1月15日，贵阳解放，12月26日建立贵州省人民政府。至1990年，贵州省辖遵义、安顺、毕节、铜仁4个行政公署，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3个自治州，贵阳、六盘水两个省辖市，86个县（市区）。1998年始，遵义、安顺、毕节、铜仁先后撤“地”改市，原行政公署所辖各市县不变。

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渊源大多与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百濮、百越、南蛮、氏羌四大族系有关，“百濮”是贵州境内最早的原住民族，其中一部分与“僚”演化为现在的仡佬族，其他各族主要多系陆续迁徙而来。其过程历